看世界

宏观经济与个体选择

□ 袁 勇

拿到一笔奖金和得知工资上调，对你的支出计划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内容就懂了一半。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的贡献。

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

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

人们通常认为，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同时央行降低利率，鼓励大家消费、企业投资；经济过热时，再适当收紧。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

但政策出台之后，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未必。

20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增加，通胀却居高不下——这种现象被称为“滞胀”。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继续刺激需求，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伤害就业。在抑制通胀、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

那么，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比如，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但人们拿到钱后，会花掉多少，又会存下多少？霍尔的消费研究，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一笔奖金，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

早在霍尔之前，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的观点。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

1978年，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连续的特征；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这就是消费“随机游走”理论。打个比方，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计划早已成型，不会再做大幅改变。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

由此可见，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

此外，在现实中，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反应也不尽相同：同样一笔奖金，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可能花掉一部分，也可能全部存起来；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食品等刚需领域。换言之，同样一笔钱，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会不会花、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

这提醒政策制定者，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获得支持的家庭，是有余力储蓄，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不同的人答案不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

在霍尔“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的基础上，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将家庭、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

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当经济遇冷，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此时，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但一定会减少备料，或者暂停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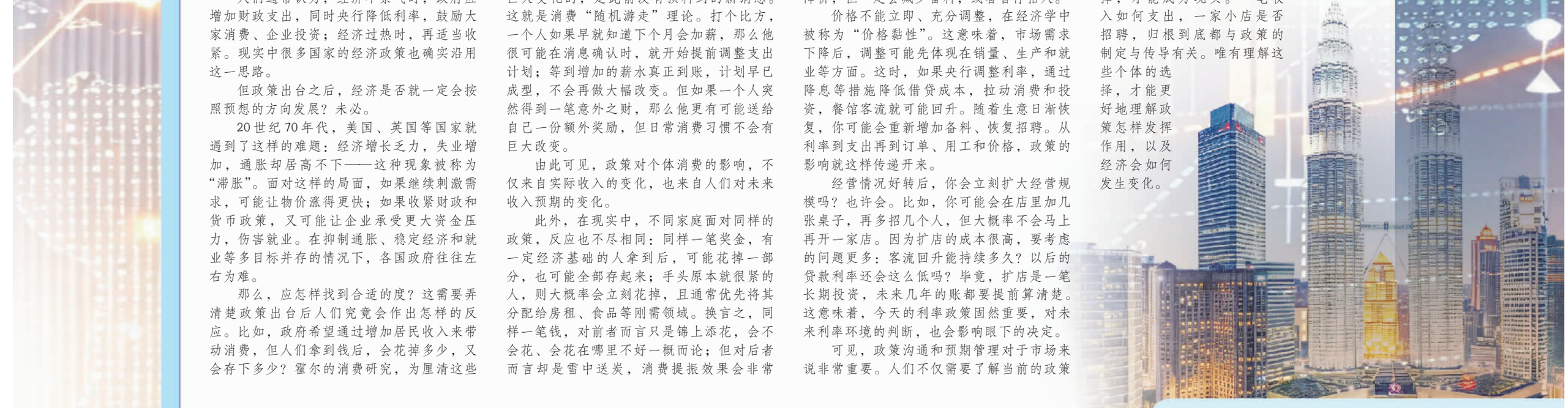
价格不能立即、充分调整，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价格黏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下降后，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生产和就业等方面。这时，如果央行调整利率，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拉动消费和投资，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随着生意日渐恢复，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恢复招聘。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用工和价格，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

经营情况好转后，你会立刻扩大经营规模吗？也许会。比如，你可能会在店里加几张桌子，再多招几个人，但大概率不会马上再开一家店。因为扩店的成本很高，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客流回升能持续多久？以后的贷款利率还会这么低吗？毕竟，扩店是一笔长期投资，未来几年的账都要提前算清楚。这意味着，今天的利率政策固然重要，对未来利率环境的判断，也会影响眼下的决定。

可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政策变化，也希望政策能够大体稳定，以此预估今后的经营状况——可信的未来政策安排同样能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预期管理要发挥效果，关键在于可信。任何一位靠谱的企业负责人都不会仅凭一句“以后生意会更好”的祝愿就选择扩产，他们会看央行的目标是否清晰、行动条件是否明确、实际做法是否与之前的表态一致。这些信息，才是企业进行未来规划的重要参考。

当然，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得多，但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无疑将整个脉络梳理成了相对简单的线条。它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政策效果，要经过一个个家庭和企业的选择，才能成为现实。一笔收入如何支出，一家小店是否招聘，归根到底都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有关。唯有理解这些个体的选择，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怎样发挥作用，以及经济会如何发生变化。



国际

来稿邮箱 gjb@jjrbs.cn

脑洞

□ 肖 瀚

经济学也“嗑CP”？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理由——“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乍听之下着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宏观经济学讨论的是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大课题”，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消费者和企业的“小决策”。这二者分别居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两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完全不一样，这突如其来的CP感（CP是Coupling的缩写，可直译为“配对”；观众通过观看配对角色互动获取快乐的过程，即“嗑CP”）是怎么回事？

要理解这对CP，需要回溯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关键节点。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核心观点是，仅靠自由市场是无法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应当由政府出面采取措施来刺激需求，而总需求增加可带动收入与消费上升，最终扩大生产规模，达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货币学派兴起。该学派强调货币供应量变动是影响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的核心因素，主张通过控制货币增长率维持物价稳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政策。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都各自有一群非常坚实的拥趸。但石油危机的爆发改变了这个双强格局，当欧美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货币学派势头渐强。

不过，货币学派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批评者认为，其思路总体偏于“粗犷”，政策效果有如水银泻地，只能借由货币传导效应层层扩散，因而施政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走上了历史舞台。该学说的核心观点是，当政策改变，居民和企业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扩大需求降低失业率，但如果企业和劳动者都意识到政府将持续实行扩张政策，就会提前调整工资、价格和消费意愿，原来的通胀与就业水平也会随之改变。

至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终于“对上了眼神”——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要理解真实的消费、就业、通胀等宏观指标，必须从消费者、劳动者和企业的微观选择出发。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贡献，恰恰在于他们吸收并进一步延展了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还原了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

霍尔最知名的理论集中在消费领域。他详细分析了意料之中的信息与意料之外的信息对消费的不同影响，并由此推导出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今天知道的信息，原则上不应系统性用于预测明天消费的变化。

伍德福德的理论贡献则更多体现在货币政策上。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著作指出，现代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政策利率调节经济，货币经济学也应当围绕利率、价格、预期和跨期均衡建立理论。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实际利率相对于自然利率的水平同样会影响消费。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实际利率，当前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就变得昂贵，家庭可能因此减少当前支出，从而使总需求下降。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央行加息能够降低通胀了。答案不仅仅在于历史数据的统计相关性，还可以追溯到家庭的消费安排、企业的定价决策以及市场的均衡调整。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未来政策的可信承诺，本身就可以改变今天的经济行为。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多国央行“前瞻指引”的重要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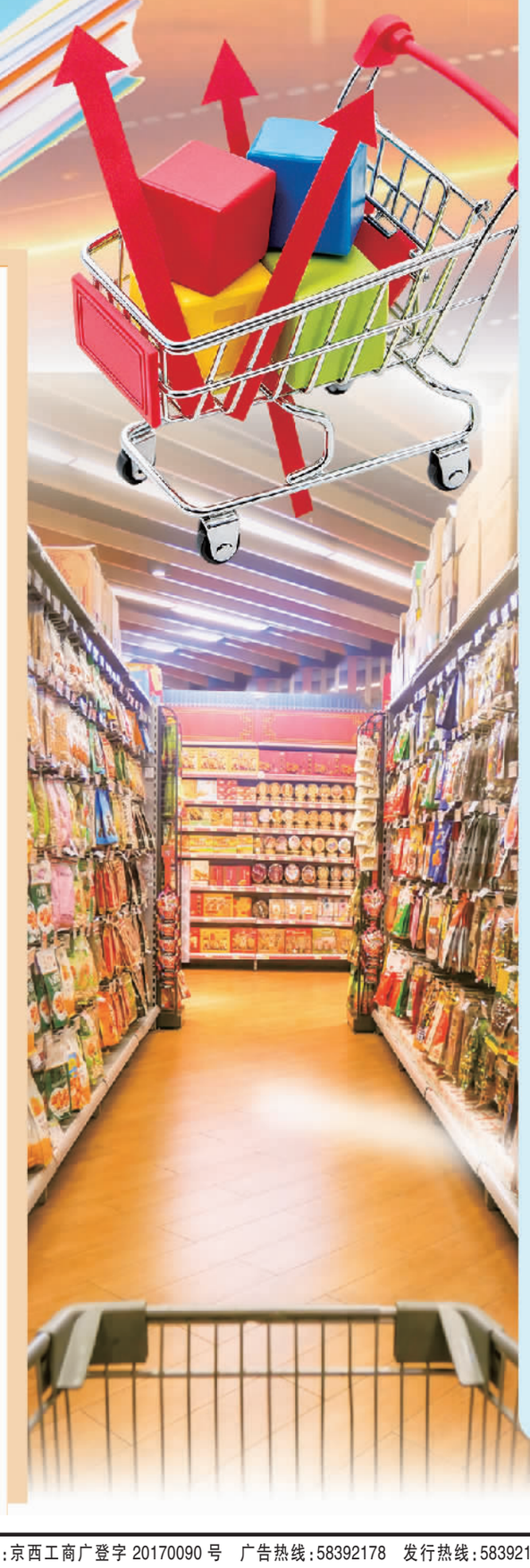
换言之，伍德福德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改变了人们观察货币政策的方式。过去，市场主要关心中央银行今天加息还是降息；现在，一则政策声明或者一句对未来利率走势的暗示，可能比利率调整本身更加重要。

如今，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又给现代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一批新问题：当技术进步同时改变潜在产出和潜在需求时，缺口究竟会发生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如果技术变革必然引起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不同家庭的消费行为又会怎样分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这些问题均说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微观经济研究的支持。尽管微观行为细碎、庞杂，甚至看起来乱七八糟，但也恰恰是这一团团乱麻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基础，并影响宏观经济的走势。

尤其是在地缘冲突频发、全球债务高企、能源价格飙升、产业链供应链不畅等多重危机交织的当下，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可预期、可信任、可协调的宏观政策去平复混乱的波动，而要理解波动的逻辑，需要沉到经济活动的最末端，去观察每一个家庭的消费行为，去理解每一家企业的投资决策，去看待每一种产品的定价逻辑。

这或许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开始“嗑CP”的原因所在。



热带度假还要戴口罩

王嘉伟 袁睿

“双子塔在哪里？吉隆坡塔又在哪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游客巴勃罗·洛佩斯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无奈地收起相机。烟霾遮蔽下，他原本期待的都市风光几乎拍不出清晰照片。“没想到来热带度假还要戴口罩。”他说。

近期，不少到访马来西亚的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烟霾笼罩下的吉隆坡照片，感叹闻名的城市天际线仿佛“消失”了。当地民众则抱怨烟霾引发喉咙不适、过敏等症状。

今年8月以来，烟霾持续困扰马来西亚。部分地区学校因空气质量恶化而停课。持续高温与烟霾等因素叠加，让部分养殖户面临家禽生长放缓、产量下降等问题，不得不增加通风、降温设施等方面的投入。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表示，此轮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尼多地持续的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印尼“努山塔拉地图集”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印尼遭火灾焚毁的森林和土地面积超过190万公顷，约为12个伦敦市的面积。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产生的大量烟霾，随季风和大气环流跨越国界，飘向马来西亚及其他周边国家。

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给东南亚带来的高温少雨天气进一步增加区域内森林和土地火灾风险。东盟专业气象中心预计，今年四季度，东南亚海洋大部分区域降雨量可能低于正常水平，气温可能偏高，跨境烟霾风险仍将持续。

跨境烟霾让整个区域同步承压。在印度尼西亚，森林和土地火灾产生的浓烟遮天蔽日，机场能见度下降，数千架次航班受到影响；在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超过200，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东帝汶政府近日也宣布学校暂时停止线下教学活动。

马来西亚气象局局长穆赫德·希沙姆表示，马来西亚正处于季风交替期，风势较弱、风向不稳定，午后和傍晚容易形成强降雨。降雨能够在短时间内清除部分空气污染颗粒物、改善空气质量；但只要其他地区的烟雾持续输入，马来西亚仍可能继续处于烟霾笼罩之中。

在全球变暖导致更加频繁的高温、干旱天气背景下，如何降低森林和土地火灾风险、加强跨境污染监测和源头治理，是区域国家共同面对的课题。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阿瑟·约瑟夫·库鲁普表示，跨境烟霾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解决。东盟成员国应履行各自责任，将区域合作的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批准接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提供的灭火援助，相关细节由印尼国家抗灾署协调落实。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表示，马方已派遣灭火飞机、直升机及人员协助印尼扑灭林火。

随着季风转换，吉隆坡那些暂时消失在天际的摩天大楼或许不久后就能重新显露身影，但从期盼一场雨到守护持久的蓝天，东南亚国家仍需付出更多共同努力。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 叙 王一伊 美 编 夏 祎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jjrbs.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00 印完时间：4:00 印刷：